一部填補空白的開創性巨著

評黃慶華著《中葡關係史(1513-1999)》

黃啟臣*

本文評述《中葡關係史》是一部內容全面系統、觀點平實正確、資料豐富翔實、結構縝密嚴謹、寫作規範流暢的巨著，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和現實借鑒意義，是迄今中國出版的涉及中葡關係的第一本好書。

1982年，我遵老師金應熙教授（時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暨南大學歷史系主任）之命，在著名澳門史研究專家、中山大學歷史系戴裔煊教授的指導下，涉足澳門歷史的研究，轉瞬間，已濫竽於此研究領域二十五年了。恕我孤陋寡聞，真正算得上是中葡關係史的中文專著，除了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周景濂所著九萬八千字的《中葡外交史》（1514-1887）這本小冊子之外，2006年3月由黃山書社出版的黃慶華著《中葡關係史》（1513-1999），則堪稱一部填補空白的開創性巨著。全書分上、中、下三冊，上冊是第1-5章（1513-1840）；中冊是第6章（1840-1911）；下冊是第7-8章（1912-1999），另有中葡關係大事記、參考書目舉要和人名索引，洋洋一百二十萬字，屬名副其實的巨著。

出於我在澳門史研究領域滾打二十五年的癖性，饒有興趣和不厭其繁讀完本書，受益匪淺，並深深感到本書具有下列優點和特點，現分述如下，與讀者分享。

一、內容全面系統，真正是填補空白。

本書突破以往研究中葡關係史多從澳門史切入、通過闡述澳門歷史的發展進程而敘述中葡兩國之間的政治外交關係的窠臼，高屋建瓴，從中葡關係史入手，將通過澳門史的中葡關係放大進行研究寫作，使全書內容更加全面系統。更加可貴的是，

作者雖然是按一般國際關係主要是政治外交關係來設計本書，卻獨具慧眼，把中葡關係置於15世紀開始的中國鄭和下西洋（1405-1433）、意大利人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發現新大陸（1492）、葡萄牙人華士古·達·伽馬（Vasco da Gama）開闢東方航線（1498）和移居西班牙的葡萄牙人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作環球航行（1519-1522）之後的貿易全球化的大環境來寫作，避免了研究中葡關係史單刀直入澳門史的狹小蹊徑，把中葡關係史一開始就放在真正的世界歷史的開闊空間去。於是作者用了第一、二章的篇幅概述世界大航海時代開始後，中國明代的對外政策和葡萄牙的海外擴張政策。然後從第三章“天朝體制與中葡關係”開始，敘述1513年（正德八年）6月葡萄牙人歐維士（Jorge Álvares）一行人駕駛馬來亞帆船、滿載東南亞國家的香料抵達廣東珠江口外南頭附近的屯門（今香港屯門）與中國私商暗中貿易，從而拉開了中葡關係史的序幕。

然後，從縱向方面，按歷史年代敘述葡萄牙旅日貿易船隊司令蘇薩（Leonel de Sousa）少校於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同廣東海道副使汪柏達成口頭協定，葡萄牙人得以進入和1573年（萬曆元年）租居澳門。再通過澳門歷史的發展，進而闡述1553-1999的中葡關係史。像這樣敘述四百八十六年的大型的

*黃啟臣，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教授，澳門史專家。

中葡關係史的史書在中國出版，算是第一本。所以我稱之為“填補空白的開創性巨著”。

二、重點突出，觀點正確，真正解決了中葡關係史的核心問題。

中葡關係史當然不等於澳門歷史，但是澳門歷史則是中葡關係史的最重要的核心內容，正如作者自己所說：

在中葡關係史上，澳門佔據着十分重要，甚至是核心的地位。因為，中葡兩國關係基本是隨着葡萄牙人入居澳門而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兩國關係中的許多重大事件，都與澳門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中葡關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第一個歷史性轉折，也都與澳門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講，澳門也可以說是中葡關係的“晴雨錶”。（……）所以說，講述自16世紀初至20世紀末中葡兩國之間五百年關係的歷史，自然也就離不開澳門和“澳門問題”。（黃著《中葡關係史》上冊第1-2頁，以下祇註本書的冊、頁數）。

因此，作者全書十分注意重點突出“澳門問題”。特別是“突出重中之重”的明末到清季時期（1553-1848）葡萄牙人長期對外宣稱“澳門是中國皇帝為酬謝他們協捕海盜而賞賜給他們”的所謂“驅盜得澳”問題，和晚清（1840-1911）時期《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訂生效後所謂“葡萄牙擁有澳門領土主權”問題。對這兩個中葡關係史的核心問題，作者集中精力，用了三分之一多的篇幅，約五十萬字，進行闡述和論證，正確地把兩個中葡兩國政治界以至史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疑案給解決了。

第一，“驅盜得澳”問題。

作者解決這個四百多年來一直爭論不休的棘手問題，在上冊第三章第六節專闢“驅盜得澳”言之無據”一目（第168-193頁）來論述。作者對“驅盜得澳”問題尋根溯源，指出：1606年（萬曆三十四年），聖保祿學院院長馬多士（Gabriel de Mattos）等耶穌會士，未經廣東省政府批准，擅自在青洲山大興土木，興建教堂、校舍和住宅。1620年（天啟

元年）廣東官府按1614年（萬曆十二年）經兩廣總督張鳴岡和巡按御史周應期批准的〈海道禁約〉第五款“禁擅自興作”的規定，派兵拆毀了馬多士在青洲所建的房屋。馬多士十分惱火，認為這是他花錢向當地人購買土地而建的，並且已經營了十八年之久，具有“佔有權”。現在中國廣東官府居然拆毀房屋，他要求當時治理租居澳門葡萄牙人內部事務的澳門議事會向廣東政府提出交涉此事。後澳門議事會於1621年5月15日對馬多士作出答覆：

按照中國的法律規定，（……）中國皇帝才是整個中國領土的真正主人，就連我們留寓的這塊土地都是中國皇帝的。所謂中國皇帝將這塊土地送給葡萄牙人的表文（按，即“金劄”），其實並不存在。

馬多士對澳門議事會的答覆當然不滿意，而申辯說：

這塊土地〔按，指澳門〕曾經是中國皇帝的，但現在卻是葡萄牙國王和居住在這個地方的葡萄牙人的，證據是，中國官員把它送給了葡萄牙人，並且得到了中國皇帝的認可。這既是傳說，也有文字記載。（……）贈予該港口和本城所在地這幾件事，還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證實，即葡萄牙人為這個國王〔按，中國皇帝〕剿滅了一個侵擾廣州城的著名海盜，為此，他們將這個更靠近廣州的港口贈送給了葡萄牙人。（……）為了表示謝意，他們給每個葡萄牙人都頒發了一道金劄。（見黃著《中葡關係史》上冊第174-175頁）

作者據此肯定：

聖保祿學院院長耶穌會士馬多士是第一個提出“助剿海盜得賜澳門”並肯定“金劄”存在的人。（上冊第175頁）

為了弄清楚這個來自馬多士提出的流傳至今四百多年的事關中葡關係史的重大問題，作者查閱了

中國、葡萄牙、法國、英國的檔案館、圖書館等歷史檔案、圖書等文獻資料，終於弄清楚了“驅盜得澳”說的來龍去脈。指出“驅盜得澳”說，繼馬多士提出之後，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Álvaro Semedo）於1637年（崇禎十年）完成的《中國通史》；意大利會士利類思（Ludovicus Buglio）在1665年（康熙四年）其著《不得已辯》；中國會士陸希言於1680年（康熙十九年）的〈澳門〉；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在1735（雍正十三年）出版的《中華帝國全志》；法里阿（Manuel de Faria）的《葡屬亞洲》；法國會士馮秉正（Joseph-Francois Marie Anede Mogriac de Mailla）的《中國通史》；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的《歷史上的澳門》；白樂嘉（J. M. Braga）的《西方的開拓者與澳門的發現》及中國學者龔柴的《中國海島考略》；陳沂的《澳門》等人重複馬多士的說法，又加油添醋以訛傳訛，使得“驅盜得澳”說直至今日仍有不少葡萄牙人和西方人堅信不疑；亦有個別中國學者認同此說（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第107-110頁，中華書局1999年版）。於是乎，作者得出自己研究的結論：

中國皇帝將澳門贈送給葡萄牙的說法，僅僅是一種傳說，無論在葡萄牙還是中國，都沒有文字記載。這不僅是我經過反複研究之後得出的結論，也是葡萄牙人經過了近兩個世紀時間的尋找之後得出的結論。（上冊第169頁）

所謂皇帝或廣東督撫為酬謝葡萄牙人幫助剿滅海盜，向他們頒授“金劄”賞賜澳門之事，根本就是無稽之談。（上冊第191頁）

我認為，作者這個結論是建立在中、葡、法、英等豐富文獻資料基礎得出來的，是貼近歷史事實的，因而是正確的。在這裡特別要提出的，是作者花大力氣找到否定“驅盜得澳”說的原始的而且是第一次披露使用的資料（即上述澳門議事對馬多士的答覆信）作為證據，是十分有力的。

第二，“葡萄牙擁有澳門主權”問題。

這是整個中葡關係史的核心問題，亦即是以往葡萄牙人往往說澳門是葡萄牙的一個省的問題。作者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用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即中冊第六章《清季中葡關係》（約三十五萬字）參考中、葡、法、英等歷史文獻，敘述1862年中葡《和好貿易章程》和1887年《和好通商條約》的談判、起草、簽約和換約的詳細經過，論證澳門主權歸屬中國的事實，把長期困擾人們的模糊認識解決了。

作者從鴉片戰爭後英國強迫清朝政府簽訂《南京條約》、英國取得中國“割讓”香港和賠款入手，敘述葡萄牙眼看英國人無條件地割得香港島佔中國的領土主權垂涎三尺，不甘示弱，附之尾驥，利用其長期租居澳門的有利條件，一方面，女王馬麗亞二世（Maria II）公然於1845年11月20日（道光二十五年）擅自宣佈澳門為自由港，向全世界各國開放貿易，同時派遣海軍上校亞馬勒（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出任澳門總督，瘋狂擴佔澳門租居界址以北至關閘地區；另一方面，倣倣英國尋找機會，同中國政府進行談判簽訂條約，企圖取得割讓澳門而取得領土主權。於是先於1862年派澳門總督基瑪良士（Isidro Francisco Guimarães）為全權代表，同中國政府代表侍郎恆祺、總理衙門幫辦大臣崇綸進行談判，於8月1日簽訂《大清帝國大西洋國議定通商章程》，其中第九款涉及澳門主權，說澳門“仍由大清國大皇帝任憑仍設立官員駐紮，辦理通商貿易事務，並稽查遵守章程。但（……）其職任事權得以自由之處，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等官駐紮澳門、香港等處各員，辦理自己公務，懸掛本國旗號無異。”（中冊第396頁）言下之意，中國政府在澳門設官是一種領事館領事性質，無疑澳門不是中國的領土了。好在此條約後由清政府換約大臣薛煥堅決反對而換約未成，遭到失效。

葡萄牙換約失敗後，企圖侵奪澳門領土主權心不死，於是又利用1876年（光緒二年）9月13日中英簽訂《煙臺條約》而提出在香港實行鴉片稅釐並徵的機會，在當時任清政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一手操縱、慫恿、哄騙下，派曾任赫德秘書、

時任中國海關總署駐倫敦辦事處秘書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亦是英人）代表清政府去里斯本與葡萄牙政府代表、葡長羅果美（Henrique de Barros Gomes）於1887年3月23日草簽了中葡《會議草約》，在此基礎上，葡萄牙政府即派澳門總督羅沙（Tomás de Sousa Rosa）同中國全權代表奕劻、孫毓汶於12月1日在北京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54款，並於1888年4月28日，經羅沙到天津同清政府換約大臣李鴻章互換條約生效。其中涉及澳門領土主權的第二、三款，重述里斯本《會議草約》第二、三款的內容，即：

第二款，定準，由中國堅准，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澳屬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

第三款，定準，由葡國堅允，若未經中國首肯，則葡國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

對上述兩款條約，一百多年來存在爭議，有兩種法：第一，葡萄牙政府及一些西方學者認為，憑此條約，葡萄牙已合法擁有澳門的領土主權。第二，中國政府及大部分中國學者認為，葡萄牙祇是取得了澳門的管理權（Administration），而管理權並非是主權（Sovereignty）。所以，從法理上說，中國始終未割讓（Ceded）澳門給葡萄牙，澳門的所有權（ownership）始終屬於中國，而所有權是主權最根本的標誌，所以中國仍然擁有澳門的領土主權。

本書作者經過認真審慎地參閱中、葡、法、英多種文字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的原文加以對比、推敲研究，否定上述第一種說法，科學地論證第二種說法，得出正確的結論，說：

1887年（光緒十三年）葡萄牙與中國正式簽訂《和好通商條約》，以及該條約自互換批准之日起開始生效，是否就可以因此而斷定葡萄牙已經取得了對澳門及其“屬地”的主權，以及這些主權是否就得到法律上的保證呢？我們姑且不論條約中外文本在措辭和含義方面存在的嚴重差別，僅就條約的葡、英文本而言，在中國及其他國家看

來，答案應該說基本是否定的，而在葡萄牙政府看來，答案也未必是肯定的。（中冊第816頁）

《里斯本草約》第三款及正式條約第三款中有關“大西洋國允准，未經大清國首肯，則大西洋國永不得將澳門及其屬地讓與他國”一語，就已經充分肯定了中國對澳門領土的絕對主權。至於《里斯本草約》，葡、英本中所謂“葡國永據（居、駐）統治（管理）澳門及屬澳門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的規定，儘管通過《光緒中葡條約》加以進一步確認，但是，這款規定仍與葡萄牙擁有澳門領土主權毫不相干，祇能說葡萄牙政府通過這一條款，從法律上限制並剝奪了中國政府對澳門的管轄權（Jurisdiction）。（中冊第816-817頁）

之後，作者列舉了《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生效後第三天，葡萄牙外長，聲稱：“我們從未指明，也不擬指明這行動是割讓領土。”（《中國海關密檔》第四卷第396頁，中華書局1992年版），和在本書第三冊列舉清朝政府、辛亥革命後孫中山領導的廣州革命政府、1928年的國民政府和1945年的國民政府都否認《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並多次向葡萄牙政府提出收回澳門的交涉。1976年葡萄牙政府接受了中國政府根據1972年6月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批准將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中刪去之後等歷史事實，最後得一個鐵定的非常正確的結論：

總而言之，無論是從法律的角度，還是從事實的角度，抑或從《光緒中葡條約》內容的角度，葡萄牙都不可能通過這個條約取得澳門的領土主權。（中冊第824頁）

我認為，至此，黃著把中葡關係史四百多年來爭論不休的核心問題即所謂“葡萄牙擁有澳門領土主權”問題給予科學的論證而解決了，可謂一件大喜事。

三、資料豐富翔實，真正做到言必有據、據必足徵。

據我所知，《中葡關係史》巨著作者黃慶華研究員原來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中法關

係史的專家，精通法語，1991年曾翻譯出版法國學者衛青心所著《法國在華傳教政策》一書。1995年始，可能是澳門將回歸的緣故吧，他下決心筆路藍縷研究中葡關係史。於是他利用1994-1995年訪問法國、1995年10月訪問葡萄牙及後來到葡萄牙進行一次長期訪問的機會，一邊學習葡萄牙語（因法語與葡萄牙語均屬拉丁語系，大量詞根相同，所以他很快就學懂和使用葡語），一邊收集葡萄牙文的大量的歷史檔案文獻資料，同時收集法文、英文、德文和西班牙文的資料。回國後，又到全國各地特別是到澳門集中葡文資料，然後開始撰寫有關中葡關係史的學術論文發表，如〈早期中葡關係與澳門開埠〉（《史學集刊》1997年第4期）、〈澳門與中葡關係〉（《中國邊疆史研究》1999年第2期）、〈有關1862年中葡條約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等。之後，開始撰寫本書，可見作者是遵循先收集資料，後寫專題論文，然後撰寫本著作的程式研究中葡關係史的。所以本書是在作者經過長期在國內外收集極為豐富的中外文資料和實地考察葡萄牙和澳門的基礎上寫成的，基礎是十分紮實的。我統計了一下，全書參考的中外文檔案、著作、譯作、論文達356部（篇），其中中文著作201部（篇），外文157部（篇）。全書直接引用中外文資料2,029條，其中中文資料1,330條，外文699條，可謂豐富至極。特別值得提出的，作者在利用外文資料中，不僅大量利用葡文資料，而且亦利用法文、英文、德文和西班牙文的資料。像這樣利用多種外文資料來研究和撰寫中葡關係史，就我所知，本書作者應是第一人。

作者在收集利用中外文資料時，都作了考其源流、鉤稽補苴考訂、比較的功夫，所以在全書論證問題時，做到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確實做到了言必有據，據必足徵，從而得出貼近歷史實際的正確結論。

同時，作者在引用中外資料時，對於論證重大問題，都盡量引用全文的資料，使得論證更有力，結論更扎實，也方便讀者理解。有許多引文數百字，甚至千字以上，例如中冊第517-524頁，作者為更好論述1840年2月1日（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高廉道奉清廷之命在澳門張貼告示，驅逐英

夷，但澳葡當局卻陽奉陰違，不肯合作，致使英國戰艦“海阿新”號（Hyacinth）得以進入澳門和英國人回澳門居住一事，作者不厭其繁地引用當時英國艦長史密斯與澳門總督邊多的幾封往來書信達4,000多字，這樣的引文使得讀者對比論證有更清楚的認識。又例如，中冊第760-763頁，為了揭露時任中國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代表中國政府於1886年7月（光緒十二年六月）與澳門總督商談和簽訂關於《擬議條約》和《續訂洋藥專條》自作主張的不良居心，作者將葡文《擬議條約》四款和《續訂洋藥專案》十六條，全部翻譯為中文引用共三頁2,200多字。我認為這樣引用資料比那種斷章取義的引用資料科學得多了。

此外，作者在列出外文參考書目或相大部分引文時，均在原文後翻譯為中文，大大方便不懂葡文的學者閱讀或引用。這種學風也是值得提倡的。以往有些懂葡文的學者，自恃於一些不懂葡文的學者，甚至威嚇說甚麼：你連葡文都不懂，有甚麼資格研究中葡關係和澳門歷史？這種各執一極端主義的學閥式態度與黃慶華先生相比，真是大相徑庭了。其實學術是天下公器，任何人都不可以以己之長去制裁別人之短而霸氣十足的。

本書的寫作也是結構嚴密、層次分明、邏輯性強，文字流暢的。總而言之，本書是中國學者既利用中文資料，又能直接用利葡、法、英等外文文資料進行研究和寫作成功的第一本巨著，標誌着中國學者不能用葡、法、英等外文資料研究中葡關係史和澳門歷史的時代宣告結束了，可喜可賀！

誠然，本書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著作。曹植在〈與楊祖德書〉中說過：“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細細看來，作者在某些中葡關係問題上的闡述尚有可推敲之處，而在寫作上有些地方仍是可商量的。例如大事年表，是否需要從葡萄牙人與中國發生關係前的374年即1139（南宋紹興九年）開始呢？至於由於校對原因而出現的漏字、錯字等，亦待改正。同時，作為中葡關係史，是否缺少一個中葡或中英文的目錄。但這些小疵卻不掩其大醇，本書畢竟是到目前為止編寫得最好的中葡關係史著作，值得研究中葡關係史和澳門歷史的學者認真閱讀參考。